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古外销瓷研究历史回顾

刘 森 吴春明 (厦门大学历史系)

陶瓷作为我国古代一项重要发明,从其产生的那天开始,伴随着我国人民同外界的接触,就开始了向海外的传播。事实证明,我国陶瓷的外输,最主要的途径是通过海上进行的,始于汉晋六朝,发展于隋唐宋元,鼎盛于明清时期,海洋交流区域逐步从东亚岛弧扩展到印度洋两岸、乃至大西洋两岸,瓷器成为古代世界“中国制造”的标志产品。瓷器的外销是一个重要的考古课题,也是经济史、中西关系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学术界也一度掀起研究的热潮。随着陶瓷考古、海洋经济史及中西关系史等课题研究的不断展开,其作为一个交叉的学术课题相应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关于我国古外销陶瓷的研究,在国外开始的相对要早些。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学者在中近东的考古调查发掘中中国瓷器的不断出土,最早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注意。世界上很多国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或更早就开始重视对这方面资料的搜集和研究了,还建立了相关的组织和机构,拥有一批专业的研究人才,四、五十年代以后,其研究更为活跃。国外的研究,以日本学者所取得的成绩最大,进行的最为深入、有序。日本三上次男、小山富士夫、三杉隆敏、龟井明德、矢部良明等学者的名字已为我们所熟识。在三上次男先生的代表作《陶瓷之路》(1969年出版)中首次提出的“陶瓷之路”这一概念。日本的学者在贸易陶瓷的资料搜集、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果。西方学者的研究对象很大程度上以各大博物馆、美术馆以及其它收藏机构所收藏的明清时期的外销西方的瓷器为研究对象,结合当时一些文献中的记载进行探讨。同时,他们还关注在亚、非以及中东等地进行的

考古发掘工作中出土的中国陶瓷器,随着欧亚航路上沉船遗迹的不断发现,沉船瓷器就成为近年欧美学者研究的最重要的内容。

国外学者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国内外销瓷研究的开始和进行。关于国外研究我国外销瓷的历史拟以专文详细论述,本文重点介绍国内学者对于我国外销瓷研究的历史。回顾我们整个研究的过程,大致可分成几个阶段:

一、研究的初期阶段: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在我国,关于外销瓷的研究历史可以上溯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代表人物是陈万里、韩槐准两位先生。

韩槐准先生被称为“研究我国古外销陶瓷的第一人”。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他就开始注意在南洋搜集我国的贸易陶瓷资料了,先后在《南洋学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南洋出土我国陶瓷器的文章,而《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一书,更是其研究的总结和代表。六十年代他还回到祖国调查了一些窑址,他的工作对福建等地区的贸易陶瓷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陈万里先生是我国古陶瓷研究中的奠基人物,20世纪二十年代,他把近代考古学的方法引入了古陶瓷研究领域,被称为我国古陶瓷研究中的“拓荒者”、“陶瓷考古第一人”。陈万里在其著作中曾提到过中国古代青瓷的外销问题,但由于条件限制,这一研究工作未能得到深入。六十年代,陈万里先生发表《宋末——清初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瓷器》,通过搜集文献记载,综合论述了我国各个时期瓷器输出的概况。他还发表了《再谈明清两代我国瓷器的输

出》一文，他的文章结合这一时期荷兰学者 T·佛尔克编著的《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使我们对明清时期我国瓷器的输出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

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还有夏鼐先生的《作为古代中非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文章介绍了三十年代他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见到的中国瓷器碎片，还介绍了在东非各国出土的有关中国外销瓷的研究材料。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处于我国古陶瓷科学研究的早期阶段，当时的陶瓷学者以陈万里、冯先铭等先生为代表也注意到了浙江以及东南沿海外销瓷窑址的问题，形成了早期对外销瓷窑址（东南沿海省份窑址）的初步认识，通过在福建晋江等地进行的窑址调查，把国外发现的资料和窑址出土的情况作了对照。

此外，在六十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也开始注意中国古代外销瓷的问题，搜集有关的图片资料，初步绘制了中国外销瓷的区域和线路图^①。

1966年以后，整个工作陷入停顿状态。

二、第一个研究的高潮：

20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

伴随文革的结束，学术上开始活跃，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古外销瓷研究进行的最为有效和有序的时期。当时，整个古陶瓷研究工作全面展开，重新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窑址调查和试掘工作，按瓷窑体系进行调查，逐步摸清了中国陶瓷发展的基本情况，同时对瓷器外销的情况也在整体上有了较清晰的把握^②。1982年的《中国陶瓷史》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它第一次全面、科学地阐述了我国古代陶器、瓷器发展的历史，是1980年以前中国古陶瓷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而其中也包括我国学术界对我国外销瓷的研究成果。在书中，分章节分别对唐、宋、元、明、清时的瓷器对外输出的情况进行了论述^③。这之后的时间里，中国古陶瓷和外销瓷的研究更为活跃，不断取得新的成就，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受陶瓷考古全国范围内窑址调查和试

掘的影响，人们在研究海外发现的外销瓷器本身的同时，把注意力放到了对沿海地区各个瓷窑体系的调查和发掘上，有关部门先后组织力量对广州西村窑、潮州笔架山窑、浙江龙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磁灶窑以及江西吉州窑、景德镇的湖田窑等进行调查和试掘，获得了第一手的窑址资料，为外销瓷研究深入、广泛的展开奠定了基础，也使得我国学者在外销瓷研究中的优势逐渐显露出来。

（二）我国陶瓷界的一些学者，为了更好地推动我国外销瓷的研究，提高我国外销瓷研究的水平，倡导、组织了“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和“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并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从此，我国外销瓷器的研究有了自己的组织机构，有了专门的研究人员，定期召开年会，这些都为我国外销瓷的研究开创了新的局面。

1980年7月，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正式成立。1981年10月，第一届中国古外销陶瓷学术讨论会在广东新会县召开。1982年，第二届中国古外销陶瓷学术讨论会在江西吉安召开。1987年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年会在晋江召开。伴随着这一热潮，出现了几本外销瓷器研究的合集，《古陶瓷研究》（第一辑）^④、《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⑤等论文集的出版是这时期成果的体现，学者们分别对各地及不同窑口的瓷器的外销情况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三）在外销瓷的研究中随时注意搜集国外研究动态。

由于南朝鲜新安海底沉船的发现、泰国对我国沉船瓷器的打捞以及我国瓷器在东南亚各国的广泛出土，引起了世界各地陶瓷研究者的极大关注，并在海外掀起了一股关于我国外销瓷器研究的热潮。国外学者相继发表一系列专题论文、专著和图录，就我国古外销陶瓷的窑口、品种、类型、运销路线、销售范围、烧造时代和中外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菲律宾、韩国和香港等地还举行过专题讨论会^⑥。

这些研究热潮也引起了我国学者的注意，在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的组织和推动下，集中翻译、引进不少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大大开阔了我国学者的视野和研究思路，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资料，一度推动了我国外销瓷器研究快速

发展的进程。《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一辑和第三辑^①是由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组织翻译的两本外销瓷研究论文集,它们集中介绍了南朝鲜、日本以及欧美学者关于外销瓷器研究的成果,涉及日本、朝鲜、菲律宾、东南亚、非洲、美国及北美等地出土中国越窑、长沙窑、龙泉窑及唐宋元时期其他窑口的陶瓷器情况。其中,绝大多数又都是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

三上次男先生的代表作《陶瓷之路》^②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其学生李锡经等翻译过来而被我国学者所熟识的,书中根据作者多年考古调查、考察资料和经验,以大量的事实,系统论述了中国古代陶瓷历经千辛万苦沟通了东西方两个世界,是一部研究中国陶瓷发展史和研究中国外销瓷的重要著作,也是研究中外关系史的重要资料。其在我国外销瓷研究中的地位至今仍无法取代。

(四) 这一时期的我国外销瓷的研究受当时学术界海外交通、对外贸易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热潮的影响很大。

当时的许多学术问题是围绕着丝绸之路展开的,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并由此形成了国际性的研究热潮^③。宋元时期飞速发展起来的泉州港逐渐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最大的贸易港,其地位显赫,泉州作为宋元时期及其以后陶瓷生产的基地和输出口岸之一,在世界性的陶瓷贸易中无疑占有重要地位。

1979年由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等单位举办了“泉州古外销陶瓷学术座谈会”,对泉州的古外销陶瓷进行探讨和研究。而《海交史研究》也成了这一阶段我国外销瓷研究成果发表最集中、最重要的刊物,之后成立的中国古外销瓷研究会的不少会员又是海外交通史的会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馆员还广泛参与了泉州、晋江等地的窑址调查和发掘,采集了大量珍贵的外销瓷标本,创立开放了“泉州外销瓷陈列馆”。围绕泉州湾,从产品、港口、海外交通等多角度出发,对这一地区宋元贸易陶瓷的情况进行探讨^④,内容相当丰富,而德化窑与磁灶窑的研究则占有突出位置。

陆培初先生的《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⑤一书也是这一时期出版的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对我国明清时期的外销瓷进行探讨的论著。

(五) 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促成了研究热点的出现。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南朝鲜新安海底元代沉船大批中国瓷器的发现^⑥,引起了全世界学者的注意,特别是中、日、韩三国的学者更是广泛参与了探讨研究。我国陶瓷考古学者也撰写文章集中介绍了沉船中的瓷器资料,并对其窑口、年代、航线等问题进行了分析^⑦。船中出土了大量的龙泉青瓷和景德镇瓷器,围绕新安沉船,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宋元时期龙泉青瓷及景德镇瓷器外销以及我国瓷器外销日、韩等国情况的集中探讨,它是综合研究的一个典型。

(六) 这时期我国的外销瓷器研究中出现了一些阶段性代表成果。

八十年代左右,以社科院马文宽先生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对非洲出土的中国瓷器开始关注,撰写了系列论文,并最终完成了代表性成果《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⑧一书,该书结合非洲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原文资料,就非洲各国出土的中国自唐中期至清中叶的瓷器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并结合国内陶瓷考古和研究的最新成果对其窑口与年代作了论述研究,内容涉及了中非海上交通、贸易交往以及中非文化交流诸方面,是外销瓷研究中地区性探讨的代表性作品,资料性和专业性都很强。

(七) 中外研究人员的交流和合作的趋势开始出现。

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中国的学者开始与国外研究者的交流。国外的学者如三上次男等开始到中国来参观、访问,我们国家也不断派出学者到国外参加各种学术活动。1989年故宫博物院邀请日本出光美术馆举办了“陶瓷之路展”,以形象的文物资料再现出历史上东西方以陶瓷为载体的文化交流盛况。

总之,这一时期对外销瓷器的历史及外销情况有了较清晰的把握,再加上新的考古发现,引起世界各地学者对我国外销瓷的关注,进而影响到我国也掀起了一股研究热潮,这一时期是我国外销瓷器研究的活跃期。但受窑址调查和发掘资料的限制,以及新安沉船、泉州贸易陶瓷等研究热点问题的影响,这一时期整个研究的重点及成果主要集中在宋元时期。

三、延续发展时期：20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

我国外销瓷的研究在前一阶段基础之上进一步向前发展。一些传统的课题还在继续，随着我国陶瓷考古工作的蓬勃进展，窑址资料极大的丰富，特别是对越窑、长沙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及江浙、福建、两广等地其他窑址资料的进一步揭示，对于外销瓷的研究也变得更深入。同时，这一时期新的研究热点和特点逐渐出现。

(一) 在窑址考古方面，福建特别是闽南外销瓷窑址的发现和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就是在中日学者共同努力下完成的。早在八、九十年代就对漳州地区明清时期窑址的调查整理中提出“漳州窑”的概念。此后福建省博物馆与日本关西近世考古学研究会“明末清初福建沿海贸易陶瓷的研究”课题下，就漳州窑研究进行了交流和合作。以此为契机，福建省博物馆也加强了对漳州地区明清窑址调查资料的整理工作，尔后，又组织了对平和南胜、五寨古窑址的考古发掘^⑤，证明平和县的花仔楼碗窑山和五寨的大垵、二垵窑址就是生产日本以及东南亚等地广泛出土的所谓的“华南窑系”或是称为“SWATOW”（即“汕头器”）的贸易陶瓷的窑址。《漳州窑》^⑥一书的出版，是这一时期窑址考古成果的集中体现，《福建文博》上也有不少窑址资料的公布。这些考古资料给人们以全新的视野和资料，开始对我国明清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窑业遗存及外销瓷产品有了进一步认识。

在这之前，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国内江西广昌地区明代万历纪年墓中克拉克瓷的发现^⑦，加上国外沉船考古中明末青花瓷器的不断发现，就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明代晚期外销青花瓷器的文章，但当时人们对于“克拉克”瓷这种外销瓷器的认识还只限于明代万历时期景德镇地区的生产。漳州窑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使得

人们对克拉克瓷产地等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从此，人们研究外销瓷的重心也从宋元时期转向了明清，围绕闽南外销瓷窑业遗存、漳州窑与月港兴衰、明清时对外关系、福建沿海私商势力的崛起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探讨^⑧。

(二) 这期间，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我国水下考古事业的逐渐开展。国外私人打捞沉船的活动促使我国在八十年代晚期成立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培养了一批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开展了一系列水下考古工作。由调查发掘古代沉船入手，在福建连江定海海域、辽宁绥中三道岗渤海海域、广东台山南海海域、广东珠海海域以及西沙群岛海域等地都发现了一批宋元明清不同时期的沉船遗址及大批陶瓷器出水^⑨，而且这些资料的公布比较及时。这些考古发现，将沉船及沉船出水瓷器引入了我国外销瓷的研究中。

与此同时，国外的海洋考古学者还在环中国海以外的地区发现了不少近古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远东航路的沉船^⑩。这些沉船及出水文物不仅十分珍贵，而且在中外交通史、海外贸易史和文化交流史方面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沉船及沉船出水瓷器日益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

(三) 与这些新特点出现不相符的是，这一阶段外销瓷的研究并没有引起古陶瓷学者的广泛参与。

随着整个陶瓷考古蓬勃进行，出现一系列新的课题和热点引起古陶瓷学者研究的重视，外销瓷的研究在这一阶段相对来说显得并不活跃。当前我国外销瓷的研究中的领军机构和组织还没有形成，对于国外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的介绍很少，虽然偶尔也能见到一些翻译国外学者的文章，但毕竟属于个人的行为，远远不能提供当今外销瓷研究中对国外出土资料的需求。外销瓷的研究是国际性的综合研究课题，需要来自外销瓷生产地、中转地、销售地和消费者等一连串的情报信息。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我国外销瓷的研究主要是延续上一阶段的发展，随着国内窑址资料的不断揭示以及水下考古活动的逐渐展开，出现新的研究热点，其中以福建地区的考古和研究成果最为突出，研究的重点由宋元转向了明清。但相对于整个陶瓷考古领域窑址考古和水下考古资料的

丰富来说,外销瓷的研究并没有获得相应的繁荣发展。虽然相关论文成果的数量可算庞大,但实质上的突破很少。

四、世纪之交新的研究趋势的出现 及 21 世纪我国外销瓷研究的展望

当前的研究虽然存在诸多不足,但也出现一些新的趋势,体现了新的形势下的要求。

(一)在世纪之交,受新的学术思想的影响,外销瓷研究传统思路逐步被打破,新的视野和角度开始出现。最引人关注的就是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提出了建立“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框架,强调从海洋思维的新视野来研究中国东南历史^①。在此学术背景之下,学者们提出了“海洋性瓷业”的概念^②,海洋性瓷业是指“以海洋为媒介、以输出海外为目的的我国东南地区古代特殊的瓷业体系,是中国东南为中心的环中国海海洋社会经济文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③它将外销瓷放在以东南沿海为中心的海洋文明史体系中予以观察、研究,认识外销瓷的海洋性特征,探索其因海洋文化的发展而兴起、因海洋文化的波动而变迁的历史互动过程。因而,外销瓷中的海洋性因素被突显。它站在全新的角度,从我国外销瓷器遗存的时空构成追述腹地的生产、港市集散、海外流通并以此探察东南海洋社会经贸体系。

(二)我国水下考古队的成立标志着科学探索水下陶瓷资料的开始,开始瓷器贸易研究中重要一环——沉船瓷器也就是输出路线上的实物资料的获取,从而也使得古陶瓷研究中的考古派和外销瓷研究派进一步结合。水下考古事业顺利开展,定期举办水下考古培训班培养水下考古人员,新的水下陶瓷资料的不断披露,必将有力地推动外销瓷的研究。从而围绕沉船和航路展开的研究将会是我国外销瓷研究中向新的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

(三)学术界发展到世纪之交的今天,在各个领域要求学科的整合及交叉学科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而外销瓷的研究正是这种趋势的最佳体现。其研究本身所蕴含的内容是巨大而丰富的,体现了考古、经济史、交通史、港史、海外

贸易史、船史、中外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它是跨学科研究的最好的课题。以外销瓷这个角度为突破口,对各种资料进行一个整合,是外销瓷研究发展到今天的一个必然要求,惟此,外销瓷的研究才可能获得进一步的突破,达到考古学中“透物见人”的最终目标。

另一方面,外销瓷的研究也将会实现从以前泛泛的概括性的探索向更为实际、细致的科学研究的转变,今后外销瓷的研究将会是一个更加细致化和深入化的过程。这两方面并不矛盾,无论是宏观上的多角度、多视野综合性研究的掌控,还是就某些具体课题更细致、深化的探讨,两种趋势都是外销瓷研究发展至今的必然趋势。由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郑培凯教授主持的研究项目“陶瓷下西洋:中国外销瓷与东西海外贸易”,于 2004 年 6 月底举办了“十二至十五世纪中国外销瓷与海外贸易国际研讨会”^④,是一次目的明确、主题集中、时代集中的外销瓷综合性研究的有益探索,也是新的研究趋势的体现。

如果说前三个阶段,更多的是资料的积累阶段,那么二十一世纪将是外销瓷研究逐步步入整合和繁荣的阶段。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相应地做好一些准备。

首先,在外销瓷的研究中,窑址资料的揭示是基础,是其它研究工作科学展开的依据,无疑我们有着先天的研究上的优势,所以外销瓷研究的主要阵地应该在我国。近年来外销瓷的窑址资料在不断披露,特别是以粟建安为代表的福建省的考古工作者,在福建地区外销瓷窑址的考古工作和资料的揭示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应该更好地认识并发挥这种优势,更为科学、规范地开展我们的工作,并及时、有效地公布最新的考古资料,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同时,窑址资料和国内外沉船资料及国外出土资料的有机结合,才能综合、深入的科学探讨。所以,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并逐步开展国际学术的分工合作。要随时吸收国外最新的考古发现资料和研究成果,继承七、八十年代的有效经验,组织力量对国外的最新资讯及时公布、介绍,多召开一些不同主题的国内、国际学术会议,还可以采用派专家互访、请外国专家

来召开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总之，除了做好我们自身的工作之外，要尽可能的及时地获取国外的最新资讯以保证我们规范、科学的学术研究的展开。

注 释

- ⑩叶文程：《关于我国古外销陶瓷研究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古外销瓷研究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1~12页。
- 此部分关于日本对我国外销瓷的研究历史参考，花岚：《7~14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绪论”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4~5页。
- 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年。
- 刘毅：《关于中国古陶瓷研究的几点思考》，《考古与文物》2000年4期。
- 陈万里：《中国青瓷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
- 陈万里：《宋末——清初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瓷器》，《文物》1963年1期。
- 陈万里：《再谈明清两代我国瓷器的输出》，《文物》1964年10月。
- 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Holland Leiden, 1954.
- 夏鼐：《作为古代中非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文物》1963年1期。
- a 陈万里：《调查闽南古代窑址小记》，《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9期。b 宋伯胤：《连江县的两个古瓷窑》，《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2期。
- ⑪李锡经：《中国外销瓷研究概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3年5期。
- ⑫冯先铭：《中国古代瓷器的外销》，《海交史研究》1980年2期。
- ⑬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
- ⑭《古陶瓷研究》第1辑，厦门大学人类学系，1982年。
- ⑮《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7年福建晋江年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11月。
- ⑯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编印《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一辑，1981年6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三辑，1983年6月。
- ⑰[日]三上次男著，李锡经等译：《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
- ⑱李根蟠：《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3期。
- ⑲a 叶文程：《宋元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陶瓷的外销》，《海交史研究》1984年总第六期。b 李知宴、陈鹏：《宋元时期泉州港的陶瓷贸易》，《海交史研究》1984年总第六期。c 徐本章：《谈谈古泉州地区的外销瓷器》，《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81年增刊。林忠干等《闽北宋元瓷器的生产与外销》，《海交史研究》1987年2期。
- ⑳陆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交流》，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
- ㉑韩国文化部文物管理局《新安海底遗物》，汉城三星文化印刷社，1984年。
- ㉒a 李德金等：《新安海底沉船出土的中国瓷器》，《考古学报》1979年2期。b 冯先铭：《南朝鲜新安沉船及瓷器问题探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3期。c 叶文程等：《从新安海域打捞的文物看元代我国瓷器的外销》，《海交史研究》1985年8期。
- ㉓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10月。
- ㉔蔡建安：《福建平和县南胜田坑窑址发掘报告》，《福建文博》1998年1期。
- ㉕福建省博物馆：《漳州窑——福建漳州地区明清窑址调查报告之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
- ㉖a 薛翹、刘劲峰：《江西出土的明万历外销青花瓷盘》《南方文物》1985年1期。b 姚澄清：《广昌发现的明代青花瓷窑》，《南方文物》1985年2期。c 姚澄清、姚连红：《江西研究克拉克瓷的新进展》，《景德镇陶瓷》总第84、85期。
- ㉗a 傅宋良：《福建平和发现的克拉克瓷大盘》，《文物》，2001年11期。b 林忠干：《月港兴衰时期的东西方贸易与闽南陶瓷》，载厦门博物馆编《厦门博物馆建馆十周年成果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c 庄景辉：《明末清初的福建海商与陶瓷贸易》，《海外交通史迹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
- ㉘吴春明、张威：《海洋考古学：西方兴起与学术东渐》，《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3期。
- ㉙㉚吴春明：《环中国海沉船》，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8月，18~52、325~341页。
- ㉛杨国桢：《关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
- ㉜王新天：《中国古代东南海洋性瓷业发展史》，年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历史系，2007年。
- ㉝李果：《中国外销瓷研究整合海内外人文科技》，《中国文物报》2002年12月17日。

(责任编辑 张海云)